

#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徐建芳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东坡易传》,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最终定稿。在苏轼看来,《周易》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

**[关键词]**《周易》苏轼;治学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0)05-0141-05

在世人眼中,苏轼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艺术成就著称,殊不知,苏轼一生治学的重心却在《周易》等经书的传解上。龙吟注评的《东坡易传》曰:“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sup>[1]</sup>这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轼一生治学的关键所在!耿亮之也说:“《易传》正是他(苏轼)的基本思想之所系……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正是《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sup>[2]</sup>可见,《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确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拟从苏轼对《周易》的研读、评价、引用及对其《东坡易传》的看重等方面来加以具体论证。

## 一、苏轼对《周易》的研治

对《周易》的研治,可说贯穿苏轼一生。苏轼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其父亲指导下研读《周易》了。如苏籀《栾城遗言》载:“公(苏辙)言先曾祖(苏洵)……二公少年皆读《易》为之解说。”<sup>[3]</sup>“二公”即苏轼与苏辙兄弟俩。这是苏辙亲口对其孙子苏籀讲的。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也曾说:“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sup>[4]</sup>此诗是嘉祐七年(1062)苏轼任凤翔判官时写的。当时苏轼26岁,苏辙24岁。因苏辙在制举考试中极言朝政得失,触怒某些当权者,只得了下等,被任命为商州推官;而知制诰王安石又与其父亲苏洵有隔阂,不肯撰告辞,等到第二年秋才下告书。苏辙愤而辞官,苏轼就写了这首诗来安慰他。劝告他用父亲早就指导他们读的《周易》来排遣内心的忧愁郁闷。同年,苏轼给苏辙的诗中还写到:“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sup>[5]</sup>他想象着弟弟在东窗下如痴如醉地读《易》,以至连门外的车马、敲门声都听不见。与其说这是弟弟读《易》的情景,毋宁说是夫子自道。

\* [收稿日期] 2010-07-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XJC751009)“苏轼与《周易》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0855006)

[作者简介] 徐建芳(1976-),女,河南南阳人;讲师,文学博士,在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苏轼四十多岁被贬黄州时,一则有了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周易》的领悟更加透彻;一则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便开始撰写《东坡易传》。如《次韵乐著作野步》“废兴古郡诗无数,寂寞闲窗《易》粗通”,此诗写于元丰三年(1080)。早年在父亲指导下读《易》时毕竟年少,对《周易》中的精微玄妙哲理体会不深;但经过几十年人世风雨的吹打,宦海风波的摧折,对人生、宇宙的规律有了更深的体悟;如今再读《周易》时才真正通晓其中的玄妙。又如《黄州上文潞公书》“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一:“轼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可见,被贬黄州期间,苏轼把他的时间、精力主要用在《周易》等经书的研治上。

晚年被贬到非人所居的海南时,苏轼继续对《周易》进行探究,并对《东坡易传》进行修订,最终完成定稿。如《夜梦》“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此诗是绍圣四年(1097)62岁的苏轼被贬海南时所作。诗序曰:“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馀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夜梦如此,不免以书自怡。”刚到这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苏轼正在为如何打发这清寂的时光发愁时,晚上突然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贪玩的小孩,当父亲来检查功课时,自己尚未完成,一下惊醒了。这一梦境可说是苏轼担忧自己能否圆满完成父亲撰写《易传》遗愿的心理折射。他自我激励说:圣如孔子读《易》尚且要韦编三绝,何况自己,更应用更多精力去钻研了。又如《答李端叔十首》之三:“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数十卷。”贬海南期间,最令苏轼感到欣慰的就是完成了《易传》等学术著作的撰写。

从苏轼诗文中可知,苏轼研治《周易》的态度极其严谨认真。为研究《周易》他曾多次向朋友们借阅参考资料。如黄州时他向陈季常“借《易》家文字及《史记》索隐、正义”,并对之说:“《易》义须更半年功夫练之,乃可出。”<sup>[6]</sup>自己不达满意绝不轻易示人,可见其治《易》态度何其严肃!又如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借示《易解》略读数篇,已深叹服……此书常患不能尽通,得此全编,为赐

甚重,且乞暂借,反复详味,庶几有所自入。”<sup>[7]</sup>从中可知,苏轼对《周易》的研读绝非一般人观其大略、不求甚解式的泛泛之读,而是经过长期认真咀嚼的。

甚而至于,苏轼在研治《周易》的过程中还学会了占筮算卦。这在他的诗文中明确记载,如《书筮》“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为《中孚》。其繇曰:‘且拯马壮吉。’……吾考此卦极精详,口以授过,又书而藏之。”《与刘宜翁使君书》曰:“昨夜梦人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觉而占之……有‘元吉自天佑之’之语,遽作此书,庶几似之。”可见,苏轼对《周易》的研治的确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

## 二、苏轼对《周易》的评价

一说到《周易》人们总是立即联想到抽签卜卦之类江湖术数,这完全是对《周易》的误解。其实,《周易》是中国一切文化思想的源头,是古圣先贤们总结出来的一部人生智慧宝典。尽管在它的创始阶段因神道设教的目的带有某些宗教迷信色彩,但它的根本宗旨则是指导人类如何顺应宇宙规律趋吉避凶、成就盛德大业。苏轼正是从这一层面看待《周易》的。他认为《周易》是圣人们创造的一部曲尽人情世态之道的人生教科书,而非用以求神问卜的异端邪说。

如苏轼解《系辞上》“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曰:“远迩,犹深浅也,得其深者虽为圣人有余,而其浅者不失为君子。”<sup>[8]</sup>在苏轼眼中,《周易》深则可以指导人成为圣人,浅则可以引导人成为君子,是一部无论根性深浅都可从中获得巨大教益的教科书。又如《问供养三德为善》“《易》者,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没,学者惑乎异端之说……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尽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悯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谦抑之心,而行之以体仁之德,以为文王之兆,无以过此矣。虽然,君子视其人,观其德,而吉凶生焉……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苏轼认为,《周易》是圣人们用来阐发人情变化规律的,而不是用来求神问卜的。自孔子去世后,《周易》的这一根本宗旨被异端邪说所淹没,致使圣人之道流为卜筮之事,这实在是易学的悲哀!在苏轼看来,人们只要“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谦抑之心,行之以体仁之

德”,就能像周文王那样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主要取决于其道德品性,而卜筮是不可恃的!又如《易论》“《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非圣人之道也……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苏轼承认《周易》起源于卜筮,但朝“挟策布卦”方向发展的并非“圣人之道”。圣人只是借助《周易》的卦爻形式来阐发天地之道、穷尽人情之变而已。

而且,在苏轼看来,《周易》只给人们指出了人生的正道,并未给人们规定具体刻板的行为方式。如《孔子赞易有申爻辞而无损益者》“《易》之为书,要以不可为必然可指之论也……然世益久远,则学者或入于邪说,故凡孔子之所为赞《易》者,特以防闲其邪说,使之从横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为必然可指之论也。”因时代久远,有些学者把《周易》歪曲成了某些邪说,因此,孔子解《易》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歪理邪说惑乱人心,为了使《周易》中所含的哲理“从横旁午”都不失正道,而并非给人们指示固定的行事方式。

众所周知,苏轼对佛、道思想也都深有研究。但他研究的结果是:佛、道之理在《周易》中都已蕴含了。如《上清储祥宫碑》:“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之说,如是而已。”在苏轼看来,道家的清净无为、虚明应物、慈俭不争等精义,与《周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的宗旨其实是一样的,都在强调顺其自然、不必妄自兴作的哲理。苏轼这一评断连理学大师程颐也由衷叹服。据《邵氏闻见后录》载:“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也。”<sup>[1]</sup>苏轼平生最鄙薄程颐,程氏对苏之态度可想而知,但程对苏的这一见解却颌首称叹,可见此论断实乃深得三昧之言。又如明代焦竑《刻苏长公集序》“苏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已从武人王彭游,得竺乾语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宗,慨然叹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苏轼少年时主要以儒家文化为研读对象,青年出仕后才经朋友指引接触佛教典籍,并为之深深吸引。但深入钻研之后发现佛教典籍里面所阐述的佛理

与易理其实并无二致,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苏轼晚年时甚至对佛、道都给予了明确否定,认为人生处世还是应以易道为指针。如《和陶神释》“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既不要去遵从道家之言,也不要运用佛家之语,因为它们都不能给现实人生以切实指导;它们所描绘的仙山与佛国都是虚无缥缈、于实际人生毫无益处的。“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源自《易·系辞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经过了几十年的大起大落、风风雨雨,苏轼深刻体悟到,还是《周易》中所讲的道理于人生更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天下之事何必思念,何必忧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平生争来斗去结果还不是跟周围人一样,何必浪费那么多精力与世人计较好恶毁誉呢?综上所述,《周易》的人生哲理在苏轼心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 三、苏轼对《周易》的引用

正因苏轼把《周易》当作一部极具指导价值的人生教科书看待,所以苏轼在进行自我修省、排遣深忧剧痛、论述治国安邦策略时,总爱引用《周易》哲学作理论依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加强自己的说服力。

据本人对苏轼诗、文、词集(除《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外)中直接引用(不包括暗用、化用)《周易》哲学的统计(限于篇幅,统计表就不列出了),苏轼共引用《周易》217次,大致可分为40多类,内容几乎涵盖了宇宙、社会、人生中的一切方面。仅就处世哲学而言,重要的可分为如下类别(限于篇幅,每类只举一例):

(一)乾健不息。《策略第一》“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二)坤厚载物。《谢除龙图阁学士表二首》之二:“岂谓太皇太后陛下,天高听卑,坤厚载物。”出自《坤·大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三)进德修业。《赐太师文彦博……》之二:“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岳之镇。”出自《系辞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四)谦以自牧。《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后生不自牧,呻吟空挟策。”出自《谦·初六·象》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五)慎重言语。《乞郡札子》“臣闻之《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出自《系辞上》“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六)洞识几微。《穆生去楚王戊》“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出自《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七)与时偕行。《贺赵大资致仕启》“与时偕行，不可则止。”出自《损·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八)居家之道。《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聊将自知明，稍积在家善。”出自《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九)交友之道。《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得之喜无寐，与汝交不读。”出自《系辞下》“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

(十)乐天知命。《欽韵答邦直子由四首》“尊主庇民君有道，乐天知命我无忧。”出自《系辞上》“……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其他关于治国安邦的：仁政爱民、君为民则、上下沟通、防微杜渐、用人之道、理财之道、通变宜民、无为自化、恪守位分、刑事法令等；关于审美追求、宇宙造化、节气时令、占卜问卦的等等，不胜枚举。对苏轼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在它文中将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 四、苏轼对《东坡易传》的看重

苏轼平生不仅创作了大量文学艺术瑰宝，而且撰著了《易传》等三部学术著作。从苏轼对自己一生事功的评价来看，文艺成就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根本不能与学术著作相提并论，尤其是《东坡易传》苏轼是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来看待的。

从苏轼诗文中可知，他始终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如《和陶杂诗十一首》之九：“余龄难把玩，妙解寄笔端。常恐抱永叹，不及丘明迁。亲友复劝我，放心饯华颠。虚名非我有……已矣复何叹，旧说易两篇。”《和陶杂诗十一首》之十：“……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离。我如终不言，谁悟角与羈。吾琴岂得已，昭氏有成

亏。”前诗说明，在晚年被贬的余暇里，苏轼没有虚掷光阴，而是在利用这难得的清静时间撰写经学著作。且常担心自己著作的学术价值比不上左丘明和司马迁。亲友们劝他应及时享乐、颐养晚年。苏轼也明白虚名对人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他惟一挂怀的就是《易传》的撰写。后诗透露了苏轼在艰难困危中仍坚持撰写经书的内在原因：圣人们所传的大道久已被那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后人就更难识别道之大全、真伪了；所以自己才不得已而写作。孟子曰：“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sup>[10]</sup>鉴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间作，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才不得已而奋起著书立说阐发圣人本意，以对抗异端邪说。于苏轼心有戚戚焉！这一幽衷在其《书合浦舟行》中也有所透露：“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碇宿大海中……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此文是苏轼由海南北归遇险时所写。“天未丧斯文也，吾辈必济”一语源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sup>[11]</sup>当孔子遭遇危险时，非常镇定地说：自从文王没世之后，文化道统不是需要我来承续吗？如果上天欲丧灭文化道统，则我就不会接触到它们；如果上天不欲丧灭文化道统，则欲加害我者又能奈我何？言外之意，恶人必不能违天害己！苏轼这里俨然以圣人之道传承者自任，认为自己所撰《易》等三书也具有传承文化命脉的价值；因而坚信自己也能像孔子那样脱离危险。又如《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论语说》亦粗备矣。”圣人著述尽管蠹坏灭绝，但其大道妙意之所以能久传不坠，关键在于后人能代代相传。苏轼极其自负地相信自己的《易》《书》等学术著作也能够担负起这种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综上所述，苏轼始终是抱着历史文化遗产者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著述的。

苏轼对《东坡易传》等的高度看重在其文中多有表露。如《答苏伯固四首》之三：“某凡百如昨，

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欲了却《论语》《书》《易》……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答李端叔十首》之三:“某年六十五矣……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苏轼回顾自己一生事业,认为那些曾给他带来巨大声名的诗词文赋皆“不足道”,唯有《易》等几部“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的学术著作才让他感到“此生不虚过”、可以“瞑目无憾”。苏轼对其《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的推重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是对《周易》的研读、评价和引用,还是对其《东坡易传》的看重与推崇,从中都可见《周易》在苏轼一生治学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地位。如果我们从《周易》哲学入手,来探索苏轼何以能够涵养成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创作出博大恢宏的文艺作品、成就其辉耀千古的伟大人格,应该是一项极有研究价值的工作。

## [参考文献]

- [1] [宋]苏轼.东坡易传[M].龙吟.注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 [2] 耿亮之.苏轼易学与其人格[J].周易研究,1996(3):32-36
- [3] [宋]苏洵.嘉祐集笺注[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35
- [4] [5] [宋]苏轼. [清]苏轼诗集合注[M].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4-122
- [6] [7] 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1566-1567,2499
- [8] [宋]苏轼.东坡易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6
- [9] 邵氏闻见后录:卷五[M]. [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983
- [10] 焦循.孟子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96:263-272
- [11] 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96:176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 On the Position of Zhouyi in Su Shi's Studying Process

XU Jian-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ldhood, Su Shi began to learn and study Zhouyi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 father Su Xun. In his middle age, Su Shi was demoted to Huangzhou and he began to write Dongpo Yizhuan. In his later years, Su Shi was demoted to Hainan and he continued to revise his works such as Dongpo Yizhuan and so on and made finalized version. From Su Shi's viewpoint, Zhouyi was a teaching material which was summarized by old sacred persons from their hard experience to guide human beings to make achievement. When Su Shi expressed his political viewpoints, human life attitude and so on, he often took the theory of Zhouyi as the basis in order to be confident in his faith and enhance convincing force. Su Shi wrote Dongpo Yizhuan by trying to carry on the big goal of sacred persons. He believed that the biggest value of his life was to have written academic works such as Dongpo Yizhuan and so on.

**Key words** Zhouyi; Su Shi; studying